

A sepia-toned historical photograph of a university campus.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multi-story building with a prominent tower and a central entrance is visible. The entrance is flanked by two large pillars.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people are walking or standing. Some are carrying items on their heads or backs. The overall scene suggests a busy academic or public space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中國近代思想與 學術的系譜

王汎森◎著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王汎森◎著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2003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80元

2005年11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王汎森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沙淑芬
校對 林志宏
封面設計 王振宇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聯經網址：<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ISBN 957-08-2593-6 (平裝)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自序

本書探討道光到1930年代大約一百年間思想學術變化中的幾個問題。這裡必須聲明的是：我並不是在寫一部通論近代思想、學術的書，而只是對這一段歷史中比較爲人所忽略的層面做一些研究。我個人認爲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它們催化了後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爲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份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爲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爲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爲「國家」，由「臣民」轉化爲「國民」、「公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也有人認爲過去兩千年的治政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層描摹」（毛澤東）。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同時，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過頭來極深刻地改變了近代的學術論述。

收在這裡的文章並不是有系統地寫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兩種限制。首先，因爲機緣不同，所以文章有詳略之異。第二，正因爲這些文章是隨著不同的需要而寫成的，所以並沒有預想一個系統。我之所以將它命名爲《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是因爲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條線索。第一部分：「舊典範的危機」，從晚清內部思潮的變動開始。方東樹的例

子，是討論方氏對漢學的攻擊在晚清思想史中之意義。方氏此舉，顯然並不只是理學的回潮，同時也代表了新時代的動向。有關邵懿辰的文章，則是探討邵氏的一本小書，如何在堅如磐石的堤防上鑿了一個小洞，這個小洞，後來逐步擴大，成為近代龐大的疑古運動的一個根源。邵氏的一些論點，代表了在時代的催化之下，傳統內部的思想因子產生的蛻變。太谷學派的出現，則代表當時的下層知識分子利用傳統的思想資源，以因應時代困局的一次並沒有成功的努力。這三篇文章，各自從不同的側面，說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一文則在說明晚清漢族歷史記憶的復活如何改變當時的政治文化，同時也討論了新的歷史記憶資源如何顛覆了官版的歷史記憶，而為晚清的歷史變動埋下種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別談清季上層及下層知識分子的四種變化，它們設定了一個背景，並作為以後諸篇文字發展的張本。

第二部分是「傳統與現代的辯證」。其中的兩篇：〈從傳統到反傳統〉、〈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都是提綱式的文字；〈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一文，儘管是針對特定的現象而寫，但也可以看做是從特定的角度談從傳統到現代曲折而蜿蜒的發展路徑。「傳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與使用中獲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中改變它的風貌。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想瞭解傳統與每一個時代的關係，必須將那個時代主動的詮釋與使用考慮進去，而不應局限於線性的因果關係。

傳統與現代複雜的糾纏，也表現在私人領域上。近代中國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是無所不在的國家化、政治化，公領域如此，思想、學術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傾向，而以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為其高峰。本書收了一篇〈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便是有關這個現象的舉例性探討。

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思想資源」的重大變化。在〈「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來說明：「思想資源」之轉移以

及「概念工具」的變動，如何改變一個時代的思想面貌。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討論了當時中國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決不是想通盤討論所有相關的細節，而只是想藉此說明，如果不考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之變化，對當時思想界的變遷就難以理解了。

人是詮釋性的動物，當一個新的概念出現之後，人們會用它來作為思考自己處境及命運的工具。在William H. Sewell 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勞工問題的書中，作者發現新的詞彙與概念使得勞工們用來思考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境況的方式產生了改變。在工廠中過著艱苦生活的人，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用許許多多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處境，但是有了「階級」的概念時，便可能賦予當前處境一種全然不同的意義。語言與概念非但表達了社會的現實，它也「建構」了社會事實。在近代中國，文化菁英先是使用一群舊概念去詮釋新東西，但慢慢地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湧入，並逐步建構了現實的發展，大約1920、1930年代，「階級」概念逐漸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胡適說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名詞運動，並在一次演講中說「一些抽象的，未經界定的文詞發揮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別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實即說明了新名詞、新概念建構現實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一文，說明西方的學說如何能以中國的面貌出現，而中國當時的困境又何以能夠逼使這類思想更易於為人接受。同時，從劉師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種兩難，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義，一方面又是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學者掙扎於一個艱苦時代的痕跡。

第三部分是：「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1905年廢除科舉，千年以來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統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舊士人走投無路，一批文化菁英由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的出現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作官不再是他們惟一的出路，他們尋找到了一個新的任務：「建立一

個學術社會」(顧頡剛)。讀者會發現這一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關。傅斯年當然不是「建立學術社會」的惟一代表，但他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靈魂人物，而我個人恰好對他做過比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寫了幾篇和他有關的文章。在這一組文章中，〈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是姐妹作，它們都討論古史多元觀的形成與傳播，我希望用它們作例子來說明一個學術詮釋典範形成的歷程。而在當時的學術界，有許許多多這種新詮釋典範出現。此外，這兩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現代思想中講求多元、強調變化的觀念如何體現在學術研究上。〈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則以身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傅斯年為例，說明他成學的經過、他的志業以及當時學術界「新」、「舊」、「公」、「私」之間的糾纏與衝突。〈什麼可以成爲歷史證據〉一文，則以一件個案來說明學術上從舊到新的轉變，以及牽涉其中的社會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間接說明了現代知識分子在建立一個新「學術社會」上的努力。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則指出近代中國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要求學術獨立，免於政治及道德教條之干擾；一種是愈來愈強的「主義崇拜」，希望以「主義」來指導一切。這兩股力量的衝突表現在許多事物中，本文則是以陳寅恪爲例，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學、仕分途以後，這個新「學術社會」的命運。

同時，在本書的一些文章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始終不會消失的緊張性。道光咸豐以來，傳統學術極力掙扎著改變自己，以求扣聯政治、社會，而在民國新學術運動開展之後，我們也可以發現學術的社會性與平民性始終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是想步趨西學，建立以問題意識爲取向的新學術，同時也希望「爲學術而學術」，將政治與道德教條對學問的干擾減到最低。但人們很快地發現：追求學術獨立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學術研究與現實致用之間的緊張、及學術社群的自我異化的問題。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徹底「對象化」、把「價值」與「事實」分離之後，也使許多學

者產生了生命意義的危機感。

在編輯這本小書的過程中，我曾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刪改；爲了使眉目更爲清楚，幾篇文章的名字也作了更動。〈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原題是〈方東樹與晚清學風〉（《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一文，原題〈邵懿辰與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陸雜誌》90卷3期）。〈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原題〈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五卷四期）。〈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原題〈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爲主的討論〉（孫敦恆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週年學術論文集》），〈「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原題是〈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爲例〉（《二十一世紀》45期）。〈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原題是〈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大陸雜誌》90卷6期）。〈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原題爲〈讀「傅斯年檔案」札記〉（《當代》116期）。〈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原題爲〈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原題是〈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123期）。此外，我也對幾篇文章的副標題作了增刪。〈從傳統到反傳統〉一文發表在《當代》一個討論反傳統思想的專輯（《當代》13期），其中也採擷了我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書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錄。〈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思與言》34卷3期）有一篇姐妹作〈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爲例〉，發表在《當代》91期（1993）我所編輯的「歷史記憶」專輯，這應該是台灣學術界最早討論「歷史記憶」的一篇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有關太谷學派的一文，發表於1994年，當時並未能直接讀到太谷學派的經典，而是以回顧二手研究的方式寫成，所以逕注頁碼於文中。該文主要是想探討它在晚清思想脈絡中的意義。我個人得以見到大量太谷學派的遺經是晚近的事。

此書編校的過程遷延至三、四年，拖了這麼多年才完成，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對我而言，將這些文章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與出版公司簽訂了一張契約，言明要編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論文集，但這件事一再延擱，始終不曾付諸行動。如果沒有陳平原兄為河北教育出版社向我苦苦催逼（按：本書有一個所收文章較少的簡體字版在該社出版），我大概是無法輯成這本小書的。本書的聯經版原與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同時進行，但因為增補了一些新文章，並進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稽延至今，應該在此鄭重說明。在此，我要感謝我的老友劉季倫先生，他對本書的編輯過程費過很大的心血，提過寶貴的意見。林志宏學弟及家弟王昱峰等人費心校對本書，我要特別在此謝謝他們。初編此書時，我個人適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作客，我也想趁這個機會感謝那裡的朋友們。

新舊篇名對照表

原篇名	本書篇名
方東樹與晚清學風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邵懿辰與清季思想的激烈化	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邵懿辰與《禮經通論》
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	「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
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
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讀「傅斯年檔案」札記	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
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

王汎森著 . -- 初版 . -- 臺北市 :

聯經 , 2003年

552面 ; 17×23公分 .

ISBN 957-08-2593-6 (平裝)

[2005年11月初版第二刷]

1. 學術思想-中國-近代(1600-)

論文, 講詞等

112.707

92008520

目次

自序	i
----------	---

第一編 舊典範的危機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3
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邵懿辰與《禮經通論》	23
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的研究	39
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	61
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	95

第二編 傳統與現代的辯證

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	111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	133
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161
「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	18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95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	221
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	241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275

第三編 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
〈夷夏東西說〉 305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321

✓ 什麼可以成爲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343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377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爲中心的考
察 463

附 錄

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 489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517

索 引 527

第一編

舊典範的危機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近代思想變化的起點究竟是什麼時候？是鴉片戰爭嗎？討論近代思想時，可以直接從漢學談到新學嗎？在兩者之間是不是有第三種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學的復興？而宋學的復興究竟只是一種古代學說單純的回潮，還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動向？

首先必須指出，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已面臨幾種挑戰。第一是內治的問題，動亂接踵而來，各種制度也出現問題，尤其是風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官僚的貪污腐化。正因為人們對貪污腐化觸目驚心，所以會出現像魏源(1794-1856)等人的「挑菜會」以及倭仁(1804-1871)等人的「吃糠會」¹。第二種挑戰是大家所熟知的鴉片及外夷的問題。

鴉片戰爭之前傳統學問已經起了種種變化。這些變化的原因很複雜，有的是學術內在發展的結果；漢學內部出現了許許多多因內在問題而產生的所謂「典範危機」。但最重要的是知識與現實、知識與人生的關係出現裂痕。當時知識分子有一個疑問：為何考證學如此發達，出版的書這麼多，而現實世界如此齷齪混亂？這個現象顯然與清初大儒的主張相違背。清初大儒說，研求聖經賢傳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但是清季學者開始質疑這個大前提：將三代社會的真相弄得愈清楚，好像也愈不可能把三代的理想付諸實行？是因為人們不肯留心致用，還是因為六經的社會與清代社會已經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將六經原原本本地行諸當代？簡言

1 關於挑菜會，見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1981），頁201，〈人日以七種菜餉客，約同人和之〉及〈人日疊韻詩〉。

之，這時候產生了一種深刻的「知識與現實世界斷裂」的危機感。人們懷疑當時居學術界主流地位的漢學考據，究竟與現實政術及道德風俗有何關聯？這一門學問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現實關照性，以致於學術自學術、社會自社會，汗牛充棟的考據學著作非但不能為現實世界帶來一尺一寸的進步，反倒有惡劣的影響？

在《書林揚鱗》一書中，方東樹(1772-1851)便將當時學問與現實世界的巨大斷裂說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這本書雖然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的，但發願撰寫則在道光五年(1825)的春天。他說當阮元(1764-1849)創建學海堂書院的隔年，阮氏首先以「學者願著何書」問堂中學生，方東樹聽了覺得非常感慨，他認為這個問題大錯特錯，阮元不應該只問學者想寫什麼書，而不問所寫的書有什麼用。故他慨歎後世著書太容易，「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於是發憤寫成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間接批評清儒拚命著書而不管現實的風氣。他在終篇中說：

藏書滿家好而讀之，著書滿家刊而傳之，誠為學士之雅素，然陳編萬卷，浩如煙海，苟學不知要，敝精耗神與之，畢世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生益處，……此只謂之嗜好，不可謂之學²。

這段話必須放在道光學術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針對乾嘉學者拚命考證著書，只管在學術社群中樹立地位與聲望，而不管他們的專業研究與整個社會的福祉是否有任何關係而發的，所以他說那樣拚命著述，如果「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生益處」，則只能說是「嗜好」，不能稱之為「學」。所謂「學」，照傳統儒家的理想，應該是承擔天下國家的實政實務。故他說：

2 方東樹：《書林揚鱗》，在《書目類編》(台北：成文，1978)，第92冊，總頁41516-7。